

東南亞—另一個“地中海”¹

鄧尼斯·隆巴德 (Dennis Lombard)

如果用當代的眼光去看印尼，一旦我們將視角從這個千島之國轉向一個它所屬的區域，馬上就會有兩個存在躍入眼簾，一個是“東南亞”，另一個是“東盟”。事實上二者只是一個看法的兩種表達方式。按年代來說它們都是晚近的產物，分別形成於 1945 年和 1967 年，而後者僅僅是前者的政治性的，或者說是半未來式的表述而已。如果不只是將眼光停留在 20 世紀 90 年代東盟遇到的困難上，²我們可以預告東南亞是前途光明的。它將快樂地處於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古老的巨人之間持續起飛，儘管會有偶爾的碰撞。它享有兩大國之間緩衝地帶的有利地位，既是中心又有與歐洲相等的面積，而同時是歐亞大陸的一個極有價值的尾部。它處於兩個亞洲大國之間，與歐洲既是一對，又遙遙相望。

但是，即使“東南亞”這個名字並不太老，作為一個“中心”，東南亞卻也並不很新，西方人稱之為“東印度”已經很久，中國人則更早就將之稱為“南洋”或“南海”。作為兩個巨人之間的一道“公共牆”，一個中國和印度的影響歷史性地相遇的地區，一個政治密度較低的地區，它比較具有柔性，使它成為一個便於施展影響的地帶。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所有連續的東南亞史中，從殖民主義的觀點是這樣來看，接著民族主義觀點又是這樣來看。但是，二者都有強調來自西方影響的傾向：首先是所謂的“印度化時代”，然後是“伊斯蘭化時代”（本質上來自伊斯蘭印度或中東）。最後當然是“西方化時代”，從 16 世紀初葡萄牙人的到來，最初由歐洲人寫成的歷史就引導讀者將目光投向歐洲，然後投向美國。這些歷史顯然將來自北方的影響減弱到最小，除了 1942 年的日本侵略的影響以外，而即使是這個事件也被視為一個變數而不是東南亞歷史的常數。

在這樣一種觀點下的東南亞地區很自然地與印度世界保持開放，連接孟加拉灣，也向美拉尼西亞開放，然而東南亞和中國的聯繫卻被生生割斷了。在這樣一種觀點下的東南亞歷史與中國的聯繫只有新近建立的“唐人街”，並且故意把那裏看做僅僅是“外國人”的居留地，這樣一來這種聯繫就是次等重要的甚至是寄生的。

這種在空間和精神上“分開”東南亞和南中國是有害無益的，儘管有許多人對此樂而不疲。它使西方的東南亞學家不必因為對中國的無知而臉紅，而又能取悅許多其他國家的研究者，包括印尼、馬來西亞、甚至越南的研究者。他們很少會想到他們的大鄰居，或和它做比較，而是更喜歡創造一個共同的死角，而不顧這將威脅他們的未來。... 今天只有日本和臺灣的商人清楚地發覺這只是一道虛構的“牆”，日本和臺灣的商人，還可以加上來自大陸的中國商人，感謝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許多年來他們正在打破“牆”的概念，他們的文化使他們感到將之理解為一個連續的整體會更好一些。

這裏我們試圖畫一張精確的速寫，雖然它只有幾條線，但卻擴大了“地區”的概念，包含了南部中國的省份，而且想像在東南亞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地中海”。所有這些並不是出自一

¹ 本文譯自法國地理期刊 *Hérodote*。Hérodote 把印尼看作伊斯蘭的“東方”。參見 *Hérodote*, no. 88, 1988, pp. 184-92, 1。

² 隆巴德這裏指的是柬埔寨問題和 90 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機，特別是泰銖和印尼盧比的危機。

種愚蠢的模仿願望，而是因為布勞岱爾的方法(Braudelian)³提供了一個世界的眼光，來使我們把兩岸都計算在內。讓我們回到他的方法的本質方面，去“重新思考”成為地理位置總體效果的兩部分，它們是同時存在的兩部分。追隨十字軍和拿破崙遠征埃及殖民北非的戰爭，布勞岱爾的書讓我們不無驚奇地重新發現緊密結合著的地理空間的統一體。通過這樣的分析，問題改變了它們的外觀：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再也不是兩個不能和解的集團，而是可以理解為兩個平行發展的集團，在非常多的場合下它們互相影響。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斷言想要理解東南亞而不結合一部分南中國，就像想要描述地中海世界卻移除土耳其、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和島嶼、巴勒斯坦和埃及一樣。用這個新的“中心”——或者說是恢復這個“中心”——的地理可以而且應該再一次幫助我們超越固有的觀念，或者一種固定風格的歷史。首先，需要解釋這裏說的南中國是什麼意思。在我看來我們明顯地需要將廣東（包括廣西）和福建，以及兩個互相聯繫的大島海南和臺灣劃進來。將雲南算進來也同樣是適當的，沒有雲南就很難理解緬甸和東京的演進，以及傣人的動態，從 13 世紀起傣人就在整個印度支那半島留下了深深的痕跡。從青銅時代起這裏就是一個地區的牽動力而遠遠不是世界的盡頭。就如我們歐洲人在 19 世紀想像的一樣，雲南總是成為一個交通和交易的地方。大乘佛教在南詔國（該國曾一度延伸至河內）的時候繁榮，當該省在十三世紀的元朝時最終、並且決定性地附屬於中華帝國時，伊斯蘭教隨著馬幫商人一起在那裏出現。與此同時伊斯蘭教在蘇門答臘立足，直到現在清邁還有一些中國的穆斯林家庭，在從事其他商業冒險活動的同時和雲南做玉石交易。

海南和臺灣這兩個大島就像從中國大陸拋向大海的兩個錨，比較它們的發展史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這兩個島起初都是由非中國人佔領的。傣人佔據了海南，南島語系人佔據了臺灣，從一個特定的觀點來看，他們都是“東南亞人”。如果說海南極早地中國化了，而且它從來沒有停止成為大陸系統的一部分（現在是一個省），那麼，在 17 世紀以前臺灣並沒有真正地被佔領過，在所有的方面被福建農民佔領，而且我們知道它最近是怎麼演進的。

從我們的分析一開始，我們就堅持連續性的觀點，連續性聯結了這些地區，從今天正式成為“中國”的地區到東南亞的其他地區。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雲南（包括貴州和廣西）的鐵礦區從北到南連接著整個印度支那和馬來半島，甚至遠至蘇門答臘的海岸。錫礦以一種相似的形式出現於整個地區，在普吉島(Phuket)發現的錫礦和在霹靂(Perak)發現的一樣，在吉隆坡郊外發現的和在邦加、勿裏洞發現的一樣。我們在臺灣和海南的特定地區發現火山活動，地震摧毀福建和香港就像摧毀菲律賓和緬甸一樣容易。整個地區都受控於季風迴圈，受颱風的影響。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都強調了同樣的事實：中國南部的動植物群和印度支那的森林不是沒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早先大象普遍出現於北部和南部。就像海南，從前南中國的沿海地區也被熱帶雨林所覆蓋，這兒的森林採伐比南部來得更早。猶如歐洲的地中海，這裏有機會讓歷史學家研究森林的退化，經濟發達的國家退化發生得更早：穆斯林國家向西退化，中國向南退化。

³ 這裏指由費爾南德·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寫的地中海世界的有高度影響力的歷史《非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e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首次於 1949 年在法國出版，後多次再版。此書之英文版見 Sian Reynolds a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由 Collins 於 1972-73 之間出版，加州大學出版社 1995 年重印。

當然非常明顯的，我們不會在這片東南亞的“地中海”發現所有原來地中海的元素。比如，我們只要一瞥地圖就可以明白地中海的大部分開放於兩個接連它的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與它形成對照的是東南亞的“地中海”則更加空曠，沒有島嶼扮演腳手架的角色，如賽普勒斯、克里特島、馬爾他或是西西里在西方歷史上所起過的作用。本來帕拉塞爾群島可以扮演腳手架的角色，但是它們坐落於一個危險地帶，早期的航海者更喜歡沿著邊緣而不是直接穿過它們。現在令人驚訝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國際遊戲圍繞這些極小的島嶼，西沙或南沙展開，這只能解釋為在較近的時間尺規內在那裏發現了儲油。

我們可以繼續一項一項地列舉不同，但是最基礎的不同很少在物質結構方面，而更多的是歷史的不同，事實是在這另一個地中海我們沒有發現一個近似於羅馬帝國那樣連續好幾個世紀作為周邊國家強大的統治者。這裏沒有真正統一的政治系統，沒有像拉丁語那樣廣為流傳的語言，沒有像基督教那樣統一的宗教。我們可以完全否定在“印度化”時代的爪哇、巴厘、柬埔寨、占婆、乃至中國，曾經確立過特定的共同文化元素，佛教和梵語在特定時代曾經發揮某種 *koine*⁴ 的作用，但其規模要小得多。

這種反對並不表示那裏沒有發現原始文化的共同基礎元素，由一種祖先的祭禮開始，聯繫到水牛，從南部中國開始，遠至印度支那、菲律賓和印尼都可以發現這種風俗。由於發現了大量史前時代（相當於西方的羅馬和中國的漢）的銅鼓，同時我們也有了“東山文化”的輪廓，從擁有豐富的青銅文化的中國西南部到伊朗的邊界，南面經過越南、馬來西亞、蘇門答臘、爪哇、巴厘、松巴哇等等。另外一個技術資訊是，毫無疑問 *braced ridge tiles*⁵ 的使用也已隨著青銅的使用而擴散。一些史前學家正在研究船棺，船棺被非常清楚地地在武夷山發現，也在北婆羅洲和菲律賓的幾個地方發現。⁶ 好幾代神話學者也在研究流傳在各地河谷居民中的民間傳說中的類似性。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中西眾多的人類學家以極大的熱情討論的客家。我們知道這些“客人”至今為止總是或多或少被認為是漢人，他們在宋朝時大量從北方遷居南方。一直以來，他們和其他集團的不同點都被認為在於他們令人驚訝地知道應該如何好好地保存他們的傳統和方言。但是今天的傾向是把他們看作土著居民，看作是南方人，這些人雖然進步了，但是並沒有完全被晚到的漢文明所同化。⁷ 他們的一些特殊風俗，比如“改葬”，可以較好地在一個“古老的東南亞傳統”中得到解釋，而較難解釋為從北方引進⁸

無庸置疑，以上這些全然不是無關緊要。在一定意義上說，它意在對那種官方正統的單一的漢民族的觀點提出疑問。我們有足夠理由認為人類學家不會將事情完全搞錯。

⁴ *Koine* 是一種混合了 Attic 和 Ionian 要素的希臘語，曾被用作希臘的公用語言，因此被引為在一個寬廣的地理空間裏被不同語言或方言的話者所使用的公用語言（英文版譯者注）。

⁵ 參見 J. Dumarçay, “La faîtière tendue (histoire d’une techniqu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no. 49, 1959, pp. 632-36.

⁶ 參見 D. Ziegler, “Entre ciel et terre: le culte des ‘bateaux-cercueils’ de mont Wuyi”, *Cahiers d’Extrême-Orient*, no 9, EFEO Kyoto, 1996-97, pp. 203-31; T. Harrison, “Niah 的偉大的洞穴：一個初級的報告 (The Great Cave of Niah: A Preliminary Report)”, *Man*, No 57, 1957, pp. 161-66.

⁷ 參見 Glen Dudbridge, 《中國的俗文化》(*China’s Vernacular Cultures*)，牛津大學，Clarendon 出版社，牛津，1996。

⁸ 改葬普遍存在於南島語世界，遠至馬達加斯加。

就像原來的地中海，歷史上早期東南亞的“地中海”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確實處於分離狀態；而且有理由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它一直保持這種狀態。沿著海岸的航線，從港口到港口，最終把所有的海岸連接在一起要花更長的時間。通過分析有關文獻，先由阿拉伯文和中文文獻入手，及利用最近幾十年內關於在所有的海岸發現的中國瓷器的研究，我們可以做成一張這些貿易路線是如何建立的大致的年表。

最古老的航線可能是西面的航線，它把從摩鹿加海峽到廣州之間的幾個經常競爭的貿易地區聯繫起來。在離開室利佛逝（這是一個廣泛用於指馬來半島和東南蘇門答臘的地名，它的貿易中心包括巴淋旁、占卑、邦加、喀拉、凌加）的一些港口之後，航線經過潮滿島（Tiomar，早在 9 世紀的一篇阿拉伯文獻裏被提到），在到達現在的越南中部海岸之前，經過一個被一些占婆公國控制的地區，這些小國既互相競爭又日益需要與來自越南南部的擴張作鬥爭。再往北航線到達東京、或現代的北越，在羈婁鎮（從中國來的和從印度、中亞來的香客在這裏相遇）發現的證據表明從 3 世紀開始這裏存在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社會，航線繼續指向東北，指向廣東、也可以到達海南島的西南點，那裏有一個很小的占婆人的伊斯蘭社區的遺跡。因此越南和廣東、廣西之間的較晚的“歷史上的”競爭可以用東京與南中國的港口之間歷來存在的經濟對抗來解釋。

沿著這條西部航線，伊斯蘭教在它的創立者死後不久傳到了中國；廣州有預言者的一個近親 Abu Wakkas 的墳墓，還有一個始建於 9 世紀的古老的清真寺，它的尖塔是一個燈塔的兩倍大小。從那個時代開始（比到達爪哇早兩個世紀，爪哇最古老的碑文只能追溯到 11 世紀），伊斯蘭教成為迴圈航行於中國海岸商人的主要意識形態。當一個叛亂於西元 879 年爆發，廣東的外國社團，主要是穆斯林，也包括基督徒、猶太教徒和拜火教徒遭到襲擊，Mas'udi 記載有 20 萬人遇害。

儘管只有較少的事實根據，仍有理由認為還有一條連接室利佛逝的航線，這條航線到達印尼的東邊，經由一系列的中轉站連接北部爪哇海岸（passir）的港口。這條古老的航線可能是青銅鼓使用地區的延伸，丁香通過這條航線運往西方，這些丁香主要是在馬魯古（Maluku）地區收集到的，和許多其他東方產品一起，從羅馬時代就聞名於地中海的市場，這就像鸚鵡，它在爪哇不被知曉，卻在 9 世紀婆羅浮屠（Borobudur）的半浮雕作品裏有很好的描繪。

我們可以在 10 和 11 世紀找到一些特殊的變化，在中國被稱為五代的時期，中國的南方占了帝國暫時危機的便宜，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自治。福建有好幾十年被叫做閩國⁹，在經濟上擺脫中國，逐漸成為東南亞經濟的一個引擎。而廣東則在南漢時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冶金生產技術的改進。在晚些時候成為屬於菲律賓的群島裏，在明達瑙島的北海岸出現了盛產黃金的蒲端（Butuan），開始用黃金交換中國的陶器。在爪哇，重力的中心從中間移到東邊。現代越南的北部地方最終擺脫了中國的監護，並和占婆開戰，戰爭一直延伸到南部。戰爭導致西部的經商航線在長期不通，該航線使得與印度、南傳佛教、以及伊斯蘭的接觸成為可能。

⁹ 參見 E. H. Schafer, 《閩國》（*The Empire of Min*）, Charles Tuttle, 東京, 1954.

然而，東南亞的重大轉捩點，事實上整個歐亞大陸的轉捩點，是 13 世紀世界史上的“蒙古時代”。¹⁰ 14 世紀中亞的土耳其各王國在騷亂之後立即關閉了馬可波羅所走的大陸貿易航線。從這個時代起“北部的重量”，這是指南中國對東南亞的重壓，幾乎沒有停止過。直到此時，不管是佛教還是穆斯林的衝擊大部分來自西南部，“印度化”可以簡單地說明這種現象。但是此後，中國的港口將發射出最明顯的信號。從 13 世紀起吳哥有一個中國社區，14 世紀在暹羅定居的中國人建立了新的阿瑜陀耶¹¹這一個商業城市，聽說此時在爪哇的北部海岸也有定居的社區，而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錦石(Gresik)。

雖然對於“蒙古征服”現象我們所知甚少，但是清楚的是：離開中亞後，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想要組織一個世界體系，這個體系不僅包括中國、東歐、伊朗和印度，而且包括所有在其東邊週邊的島嶼和國家，包括日本、越南、占婆、緬甸和爪哇。接下來的兩個世紀將要看見新的重力中心的出現，看見許多港口城市的衰落，更重要的是還可以看到東方海上航線的發展，這條航線經過呂宋、民多洛、歸仁等中間站，連接福建的港口，一方面經過明達瑙到達婆羅洲，另一方面到達蘇祿(Sulu)和馬魯古(Maluku)。與此同時，在另一個海岸，1471 年越南人征服占婆的首都歸仁，進一步確定了西部航路的衰落。

從這個時點起，我們可以說迴圈已經合攏，從此以後南洋成為東南亞的“地中海”。從 13 到 16 世紀，我們目睹南部福建大港的值得注意的發展：漳州和泉州，然後是廈門。其後的兩個例子裏，一個穆斯林碑文證實了一個很大的外國社區的存在，這個外國社區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構成。強大的福建商人不僅在爪哇、大泥和菲律賓，而且在廣東和海南也建立基地。與此同時，一些我們稱之為倭寇的獨立商人，其中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利用良好的條件在中國和日本的港口之間發展了私營商業，也在東南亞發展商業，那兒沒有國家看管它。

在 15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鄭和的遠征不僅穿過了南海，並且遠行至印度、麥加、甚至非洲的摩加迪沙。遠征在 1436 年以後停止，這個中斷通常被解釋為中國希望“退出”。國家遠征的結束並不意味中國僑民移居的結束，當然這一點仍然需要得到證實。我們可以自問：當西方死抱著“公司”不放，連續兩三個世紀打擊“私商行為”時，中國人是否已經進入了一種私商系統，而這種私人交易系統如今是到處風行了。

從 16 世紀開始情況有所改變，部分原因是因為歐洲人的出現，葡萄牙人先到，然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但這僅僅是部分原因。福建漸漸失去了首要地位，而廣東則又恢復了從前的地位，在一個只有很少自由的系統下，1557 年設立了十三行（公行），到了 1720 年中國的官員通過公行系統能夠較好地控制西方人。比起福建，中國開放廣東的方式總是顯得不夠寬，而且比較容易受到操縱。

不管是日本在 1638 年正式關閉港口，還是中國在明清時的幾次關閉港口，我們仍然不能確定這些偉大的北方的亞洲國家是否選擇了一個“防衛的”政策，他們用這種政策去反對得到勝利的西方商人。然而相反的情況更可能是真實的。一方面，他們極大程度地控制了特定的商品流動，墨西哥銀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通過中間商馬尼拉大帆船運到中國，或者中國的絲綢通過出島運到日本。另一方面，他們散居在各個重要的地方。通過散居在各地，中國人建立了資本

¹⁰ 參見 S. A. M. Adasheed, 《世界歷史上的中亞》(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 MacMillan 出版公司, 倫敦 1993。

¹¹ 參見 Chamvit Kasetsiri, 《阿瑜陀耶的升起: 14-15 世紀的暹羅史》(The Rise of Ayutthaya: A History of Siam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Duang Kamol, Bangkok, 1976。

主義網路，從那裏起源了幾乎所有今天東南亞的國家的商人階級。17 世紀初日本人也在阿瑜陀耶、會安(現代的中部越南)和巴達維亞建立了重要的“日本街”，然而他們所有的優勢都在 1638 年關閉港口以後喪失了，港口關閉有效地禁止了私人個體的離開。雖然在明治之後他們在所有方面奪回了優勢，但那已是 20 世紀初。

與此同時，歐洲商人的故事就不那麼精彩了。在 16 世紀葡萄牙人和 17 世紀荷蘭人贏得“偉大的成功”之後，當他們和國姓爺對抗時，還是極其可悲地被迫退出福摩薩。18 世紀的報告就十分平凡了。自從 1638 年被趕出日本以後，澳門只好與望加錫或帝汶做點小生意混混日子，檀香貿易記錄雖然不錯，但是很難認為是比較重要的商業。當歐洲發生拿破崙危機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日子也不好過。英國和法國¹²公司很難生活得更好，19 世紀的事件給人一種印象以為西方人最終在 1815 年以後相處融洽了，達成了一個協議，共同“開放”中國和日本。但是，對照 20 世紀的事件，使我們產生疑問：他們是否有能力控制該地區，他們是否能夠保持自己的地位。

總之，“地中海”的觀點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它幫助我們糾正一個傳統上的“中心”，提供了另一個更大的空間、更長的時間的統一體。而恢復它的完整性並且有意識地從一個非傳統的觀點去思考，則東南亞的故事可能會有一個合理的機會使它從一直被禁閉著的“兩極化”歷史中解放出來(在這種史學中民族主義史學一直毫無獨創性地跟從殖民主義史學的腳步)，並從描述同時代地域聯繫網路的新研究法中得益。在這裏請允許我強調，將南中國重新置入東南亞的視野並不會像頑固軟弱的人們想像的那樣會“破壞堤防”。真正重要的目標是將整個南中國向比較研究開放，而這一個宏大的工程不應當使任何一個人望而卻步。

@2007 何潔譯

¹² 關於法國公司和中國貿易的困難，參見 L. Dermigny 的出色的研究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SEVPEN, Paris, 1964, 4 vols.